

新 哲 学

第五辑

 大象出版社

新 哲 学

第 五 辑

主 编

王中江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哲学. 第5辑/王中江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2

ISBN 7-5347-4026-6

I. 新... II. 王... III. 哲学—文集 IV. B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7106 号

出版人 李亚娜

策划人 耿相新

责任编辑 吴韶明

责任校对 方远石平

封面设计 秘金通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80 千字

定 价 31.6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66202901

激活哲学智慧
亲证终极信念
关注公共生活
化解人类风险

责任编辑 吴韶明

封面设计 秘金通

学术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任继愈 李学勤 叶秀山 庞 朴 汤一介 余敦康 李亦园
耿云志 杜维明 陈鼓应 韦政通 罗多弼 黄俊杰 王树人

学术委员(按姓氏笔画)

万俊人 王 路 王晓朝 王葆珏 刘小枫 刘笑敢 许纪霖
孙 歌 刘岳兵 汪 晖 李存山 李明辉 何怀宏 吴国盛
陈 来 陈少明 杨国荣 张汝伦 张祥龙 张曙光 张斌峰
郑大华 庞元正 赵敦华 胡 军 姜广辉 郭齐勇 钱永祥
倪梁康 徐友渔 高力克 高瑞泉 葛兆光 童世骏 景海峰
韩庆祥 韩 震 彭国翔 慈继伟 黎红蕾

主 编 王中江

本辑作者

王 路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唐文明 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宋继杰 清华大学哲学系讲师
安乐哲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学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广保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方朝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程 钢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竹元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留学生
阿马蒂亚·森 剑桥大学教授
强以华 湖北大学哲学系教授
孙君恒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庞永红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
杨 帆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任剑涛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
吕茂相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
干春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魏常海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大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黄棕源 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目 录

影响 20 世纪中国哲学观念的源流:为 Being 正名

翻译与理解

——为什么是“是”? 王 路(1)

理解与会通

——Being 问题与汉语思想 唐文明(16)

Being 的问题:海德格尔、卡恩与语言学相对主义者 宋继杰(24)

中国哲学:研究与反思

当代西方的过程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 (美)安乐哲(Roger T. Ames)(42)

后牟宗三时代本体与诠释的一个可能方向 张学智(49)

刘敞的《春秋》学与庆历新经学 张广保(59)

儒学在美国:动向与反思 方朝晖(88)

人是礼仪的存在

——芬格莱特《论语》礼学思想研究 程 钢(112)

论胡适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尤其对中古和近世)的逻辑结构及其困境

..... (日)竹元规人(145)

经济的道德视角:经济伦理漫谈

经济学、商业准则和道德情操

..... (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 刘顺厚译(176)

经济公平的经济伦理思考	强以华(186)
经济与伦理的和谐追求	孙君恒(194)
从“经济人”到“契约人”的伦理意蕴	
——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的伦理维度	庞永红(202)

公平与效率:悖论?

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杨帆(209)
以公平追求效率 以效率成就公平	任剑涛(218)
公平与效率:在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观的视野里	吕茂相(224)

近代东亚宗教

从孔教会看儒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从康有为到陈焕章	干春松(232)
近现代中日佛教的人间性	魏常海(257)
日本“国家神道”思想体系解构	张大柘(268)
李敦化新人哲学述评	(韩)黄棕源(286)

编后卮言	(308)
------------	-------

翻译与理解

——为什么是“是”？

□王 路

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是”与“存在”的讨论比较热烈,文献也比较多。我从1998年发表论文《“是”、“是者”、“此是”与“真”——理解海德格尔》,到2003年出版专著《“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可以说是这一讨论的积极参加者。人们谈到一种“从古到今,一‘是’到底”的观点,^①这即使不是完全指我,大概也与我的观点有很大关系。我主张用“是”来翻译和理解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 being,批评把它翻译为“存在”或“有”。特别是,我强调西方哲学中在 being 这个问题上一脉相承的思想与联系,反对从中文字面上阉割对它及其思想传承的理解。而且,即使是在主张应该把它翻译为“是”的人中,我的观点与许多人也还是有区别的。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区别是,我不太注重中文“是”这个词是不是有“存在”的含义,也从不论证它的这种含义,^②尽管我说过它有这种含义;^③另一个比较主要的区别是,我没有以“是”为核心和思路来探讨一种“是”本身的哲学。^④ 我所努力做的主要是围绕着如何理解西方哲学。因此,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解,其他

① 参见赵敦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十个误解——从 Being 的意义谈起》,载《哲学动态》2004 年第 10 期,第 8 页。

② 比如,王太庆先生就非常重视论证中文“是”这个概念中表示“存在”的含义,他似乎是要以此论证用“是”来翻译 being 的合法性。参见王太庆:《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载《学人》第 4 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③ 参见王路:《“是”的逻辑研究》,《哲学研究》1992 年第 3 期;载王路:《理性与智慧》,第 351 页,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④ 例如,萧诗美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参见萧诗美:《是的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则不那么重要。正因为这样,我才在西方文献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因为理解乃是以文本为基础的。这一点大概也是我与其他人的另一个区别。

最近,也有一些文章谈论“是”的翻译问题,比如它的可译不可译。我认为,翻译乃是与理解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围绕“是”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还是理解。因此我想围绕着理解与翻译的问题,谈一谈 being 为什么是“是”,而不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一、系词

在理解 being 的过程中,我介绍并强调卡恩对古希腊语中 einai 的研究成果,即在其系词、存在和断真这三种用法中,最主要的是系词用法,这一用法的比例占他统计该词用法的 80% 或 85% 以上。^① 我认为这一成果很重要,对于我们理解 being 很有帮助。根据这一点,我们应该把 einai 翻译为“是”,并根据“是”来理解它。

对于我的这种看法,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看法或批评。比如,有人认为我对卡恩的成果介绍得有问题,而卡恩的结论并不是我所介绍的那样的系词、存在和断真用法;^② 有人认为,我对卡恩的介绍不全面,因为卡恩的研究主要是为了“阐明希腊文动词 be 的日常用法和意义,为解读希腊文动词 be 的哲学用法奠定语言基础,所以对西方哲学的 ontology 的历史性考察不属于他的研究范围”^③。有人则干脆质疑这种统计结果,质问:“哪怕我们统计出在古希腊文中,这个词的系词用法超过 95% 乃至更高,能够排除这个词在使用中实际存在的多义性吗?”^④

以上三种批评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不太重视我特别强调的卡恩所得出的 einai 这个词的系词用法。恰恰是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在西方语言中,being 这个词无疑有多种含义,卡恩所说的系词、存在和断真用法不就是指出了它的三种不同含义吗? 问题是,在它那众多含义中,有没有一种最主要的或比较主要的含义? 如果有,那么当我们理解这个词的时候,或者说理解由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时候,我们是首先应该理解它那种最主要的或比较主要的含义,还是应该理解它那些次要的或比较次要的含义? 即使说卡恩所分析的那些是自然语言的含义而不是哲学领域中的含义,难道当自然语言中的一个概念成为哲学探

① 参见王路:《关于希腊文动词“einai”的理解》,载《中国学术》,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1 辑。

② 参见陈村富:《Eimi 与卡恩——兼评国内关于“是”与“存在”的若干论文》,宋继杰编:《Being 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第 257~268 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③ 王晓朝:《eimi——卡恩的希腊 ontology 的语言学导论——与王路教授商榷》,载《学术月刊》2004 年第 6 期,第 10 页。

④ 杨学功:《从 ontology 的译名之争看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宋继杰编:《Being 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第 299 页。

讨的概念时,它那些自然语言中的含义就消失了吗?即使说哲学讨论有特殊性,因而会使自然语言中的一些含义消失,但是难道会使一个概念最主要的含义消失,而保留它的一些次要的含义吗?特别是,难道哲学讨论的方式是像有的批评者描述的那样,即可以完全不顾日常语言的最基本(哪怕是95%以上的)含义,而把非常小的一部分(甚至是不足5%的)含义当作最主要的含义来考虑吗?正是在对这些不同的含义的思考上,存在着理解的问题。

我认为卡恩的研究成果非常重要,乃是因为它不仅为西方哲学家,而且为我们中国哲学家理解 being 的含义提供了一个基础,这就是系词用法。西方哲学家一般认为,“是”乃是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主要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存在含义,另一种是系词含义。有一些哲学家则认为,在这两种含义中,存在含义先于系词含义。中国哲学家则一般认为,“存在”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和问题。因此,同样是谈论存在,我们与西方哲学家的理解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他们认为核心问题乃是“是”,“存在”乃是“是”的一种含义,尽管有一些人认为这种含义是优先的和主要的,而我们则一般认为“存在”本身就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卡恩的研究则表明,“是什么”是古希腊语日常表达的最基本用法,这种最基本的用法说明,being 的最主要含义是系词,而不是“存在”,而且“存在”用法是从系词用法演变而来的,因此没有理由说它的含义优先于系词用法的含义。卡恩研究的是动词 to be 在古希腊语中的表现形式,他的结果是这个词的最主要的用法是系词。他以自己的研究结果反驳了 to be 这个词的存在一系词两分的看法,也反驳了存在含义优先的看法。在我看来,他的成果也为我们中国哲学家理解西方哲学中的这个核心概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多年,都知道“是什么”是古希腊人探讨世界的本原和与人自身相关的问题的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它既是提问的方式,也是回答的方式。卡恩的结果使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哲学家独有的,而且也是古希腊日常表达中最普遍的方式,因而也是日常表达的最基本的方式。因此,哲学家与常人一样,他们探讨问题的表达方式与日常表达方式是一致和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哲学家从反映了日常认识的日常表达中一些看似平凡的东西提出了问题,并且通过自己的讨论而得出各种各样并不简单的结果。因此,哲学的一些主要概念和核心问题,如“是”、“存在”、“真”、“必然”、“可能”等等,恰恰也是日常表达中最基本最常用的一些概念。正是由于哲学与日常认识有着这样的一致与不一致,它才会对日常认识有意义,因而它才会有自身的意义。大概没有什么人会以为,哲学概念是哲学家凭空造出来的,哲学是哲学家自己关在屋子里瞎想出来的。因此我认为,卡恩为我们提供的古希腊语的分析结果,不仅可以是我们理解古希腊语日常表达中“是”的含义的根据,而且也可以是我们理解古希腊哲学中这个概念的含义的根据。比如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哲学研究的“是本身”,即使我们不认为它就

是日常表达中的这种“是”,至少也不能说它与日常表达中的这种“是”没有任何关系。

一个词在日常表达中有多种含义乃是正常的,在哲学讨论中有多种含义也是正常的。问题是,在一个词的众多含义中,哪一种是最主要的?因为这将直接导致对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理解。西方哲学家中关于 being 的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的讨论乃是对 being 这个概念的讨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中国哲学家今天讨论应该把它理解为“是”还是应该理解为“存在”,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卡恩的结果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因为它说明,系词用法是这个词最主要的用法。我们无法相信,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可以不考虑它的这种最主要的用法。而一旦考虑系词用法,我们就一定会想到“S 是 P”这种句式。这样,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概念就一定要能够反映出这样的句式,即它应该使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至少可以想到这样的句式。

我强调对“是”的系词含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卡恩研究结果的学习,但也不是仅仅局限于这里。认真阅读哲学文献,其实不难发现,对系词含义的探讨实际上在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中都是存在的。比如在亚里士多德^①、康德^②、黑格尔^③、海德格尔^④等人的著作中,虽然看不到他们像卡恩那样系统地分析论述日常语言中的系词含义,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他们在探讨 being 时非常明确地论述系词含义。这至少说明,他们对系词含义是清楚的,而且也是重视的。因此非常保守地说,我们至少不能认为他们对于 being 的讨论排除了对系词的考虑,而卡恩的研究结果则可以使我们非常肯定地把对系词的考虑放在理解这个概念的首位。

being 的系词含义主要来自它的句法作用,即“S 是 P”中它联系主语和谓语的作用。换句话说,“是”的含义是通过它在句子中的作用体现的。也可以说,这样一种句法作用本身其实没有任何具体的意义。因此,理解西方哲学,对于我们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来说,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直观上不明白为什么西方人要讨论这个“是”,也可以不明白他们讨论的这个“是”乃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不能首先从字面上阉割这种理解的可能性,也不能以阉割这种理解的可能性为代价而自以为理解了西方哲学。因此,保留系词含义的字面特征,乃是理解的前提。

① 比如参见 Aristotle: *The Works of Aristotle*, ed. by Ross, W. D., Oxford 1972, vol. 1, 19a20 - 22。

② 比如参见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Suhrkamp Verlag 1974, Band 2, s. 533。

③ 比如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 300 页,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译文有修改,参见 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I., Suhrkamp Taschenbuch Verlag 1993, s. 309。

④ 比如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165 页,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三联书店,1987。译文有修改,参见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Max Niemeyer Verlag 1986, ss. 159 - 160。

二、“是”与“存在”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把问题简单地归为一点:西方哲学中的 being,究竟是“是”还是“存在”?显然,“是”和“存在”是两个不同的词和概念。但是在我看来,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这个问题却没有那么简单。它至少可以区分出两个层次。一方面可以问:“是”和“存在”是 being 的两种不同含义吗?另一方面也可以问:“是”和“存在”本身是两个不同的词和概念吗?直观上说,如果它们是不同的词和概念,似乎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因为中文的“是”和“存在”就是两个不同的词和概念,正好可以对应使用。但是如果它们是 being 这同一个词的两种不同含义,问题就会有些复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把 being 的一些用法解释为“是”,而把 being 的另一些用法解释为“存在”。即便如此,人们也已经有了一个表示“存在”含义的词,并且用它来解释过去人们用 being 所表示的含义。这样自然也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存在”与“是”有什么关系?作为词,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作为概念,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样的考虑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没有“存在”这个词和概念的条件下用 being 来表示存在,与有“存在”这个词和概念并用它来直接表示存在,乃是根本不同的。

从西方文献来看,existence 这个词是表示“存在”的。这样,being 和 existence 之间就有我们以上所提出的问题。从中文翻译来看,由于一些人认为应该把 being 翻译为“存在”,为了区别,他们把 existence 翻译为“实存”。这样,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不仅有以上那些问题,而且还有“存在”与“实存”的关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字面上,“是”与“实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就为我们理解西方哲学带来了许多问题。不过,我不考虑这个问题,而只集中考虑“是”与“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想谈一谈 being 的“存在”含义。“存在”这一概念是我们今天都有的,因为有了“存在”这个词,当然就可以表达这个概念。尤其是当我们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中 being 的一些用法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存在”,因此可以说,being 这个词有存在用法。比如,卡恩认为,古希腊动词 einai 的主要用法是系词,即“S 是 P”中的“是”,它联系句子中的主语和表语。但是它也有另一种用法,这就是这个动词前移至句首,由此引出它所要说明的名词,即“是 SP”。这样使用的“是”乃是对主语的修饰和强调,具有一种表示存在的力量。比如,“一个人在门边”是一般的表达,而“是”前移到句首之后,字面的意思是“是一个人在门边”,由于“是”的强调作用,即强调由它所引出的那个词,即“一个人”,这里实际表达的意思是“有一个人在门边”,即表示存在。在这样的表达中,跟在名词后面的一般是表达位置的词或短语,但是后来在特定情况下,这些表达位置的词或短语有

时候可以省略,出现了“是神”这样的表达,表示存在,即“有神”。^①

这个例子可以非常清楚地表明,“是”和“存在”是 being 的两种不同的含义。因为它们主要说明,being 有一些特殊用法,而这些特殊的用法与它通常的系词的用法不同,表达的意思是“存在”。但这些不同乃是这个词的用法的不同,因此是它的含义上的区别,字面上却是相同的,即都是“是”。尤其是根据卡恩的解释,einai 的存在用法最初只不过是系动词前移,即它只是由“S 是 P”变为“是 SP”,这使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这一变化中,不仅 esti 这个动词本身没有变化,而且它所体现的这个句子的主谓结构都没有变。正是 esti 在句子中这种位置的变化,导致了它所表达的意思的变化。相应的英文表达则是 there is,英文不能把 is 放在陈述句的句首,因此要在这个动词的前面加上 there 这个词。这个短语的意思无疑是“存在”。但是尽管如此,is 依然在那里。只不过人们认为,这里的“那里是”(there is)表达的是“有”或“存在”。

又比如,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除了主要讨论“S 是 P”这样的句式以外,他有时候也谈到“人是”、“荷马是”这样的句子。由于这样的表达中“是”后面没有跟任何东西,因此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是”表达的意思是存在。^②

这个例子也可以表明,“是”和“存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显然,亚里士多德只使用了一个词,即他说的“S 是 P”中的“是”和“人是”(或“荷马是”)中的“是”乃是同一个词。如果我们仔细看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就会发现他对这种区别是有认识的,比如他区别出“纯粹的是”和“是如此这样的”;^③但是他也认为,“是”与“是某物”区别很小,以至它们好像没有什么区别。^④由此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亚里士多德使用和探讨的是同一个词,他在这同一个词区别出两种不同的用法,而且,即使在他的区别中,“是”这个词本身并没有变,他是通过对它的修饰来说明它的不同用法的差异的。

确实有一些人认为,“荷马是”表达的意思是“荷马存在”。因此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种“纯粹的是”,即“是”后面不跟任何东西的用法,表达的是“存在”。但是,人们这是在用“存在”这一概念来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这个词的一种用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定首先有了“存在”这个词,它表达存在的概念,并且人们认为它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荷马是”中的“是”所表达的意思。因

① 我曾比较详细地介绍过卡恩关于 einai 的存在用法的说明。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第 53~70 页,人民出版社,2003。

② 我也曾比较详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第 148~158 页。

③ 参见同上书,第 439~440 页。

④ 参见同上书,第 155 页。

此,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的用语是一回事,人们的解释中的用语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这里也有一个如何理解古人的问题,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里不仅有如何理解古人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因此这里语言的层次和语言所表达的意思的层次,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混淆的。

其次,我想谈一谈“存在”(existence)这个概念。今天,人们毫不犹豫、非常明确地使用“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有这个概念,而且人们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比如,除了“上帝存在”这个命题以外,人们探讨一种东西是不是存在,还谈论“存在主义”,等等。因此很明显,“存在”与“是”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以肯定地说,这个词和概念的使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人们用“存在”来理解“是”的时候,却会有一些问题。在我看来,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用“存在”解释“是”,而在于用“存在”翻译“是”,从而导致一种看法——好像西方哲学中一直就有“存在”并且一直探讨的就是“存在”。

一个直观的问题是,“存在”是不是一直是西方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前面说过,根据卡恩的研究,einai的最主要用法是系词,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词,因此它表达的乃是“是”。也就是说,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应该是“是”,而不是“存在”。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对上述问题的否定的回答。但是同样根据卡恩的研究,“是”有不同的用法,其中一种用法表示存在,难道不能认为当以这个词为核心概念的时候,已经考虑了“存在”的含义了吗?我不反对可以根据“是”的存在用法认为它也有存在的意思,但是我要问的是:含有存在意思的“是”本身与“存在”本身是不是就是一回事?也就是说,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是”并以它来涵盖存在的意思,与有一个明确的“存在”概念是不是一回事?我认为,这里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哲学是以概念思维的方式进行的。所谓概念思维,简单地说,就是抽象。具体地说,就是人们从日常思维活动中一些最普通常见的表达发现问题,把它们抽象到概念的层面,进行理论探讨。而这种抽象过程的主要体现之一就是形成概念。因此,一个概念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往往反映了哲学的进步。比如关于“是”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们从日常最普遍最常见的问答“是什么”和“是如此的”,抽象出其最核心的东西“是”,形成一个概念,并在概念的层面上进行探讨。亚里士多德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它提高到最普遍概念的层次,涵盖一切学科,成为哲学的核心概念,体现了哲学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有一个概念与没有一个概念乃是根本不同的。又比如关于“存在”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们一直探讨“是”,由于它有各种用法,因而可以有各种含义。其中有一种用法与通常所说的“S是P”中的“是”的用法不同,因此含义也不太一样。后来人们发现,可以把这种含义抽象表达为“存在”,因而不只形成一个新概念,而且通过这一新概念把“是”的这种含义具体化。

由于有了“存在”这一概念,人们不仅可以用它来解释“是”的一部分含义,而且还可以围绕“存在”本身来进行讨论,并且形成关于“存在”的理论,这样又形成哲学的发展和进步。因此,有一个概念与没有一个概念确实是根本不同的。

实际上,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这里还有更为复杂的问题。由于“存在”这一概念的产生与中世纪宗教神学讨论“上帝是”有很大的关系,^①因此如果不区别“是”与“存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存在”这个概念与“是”的存在含义混淆在一起,就无法清楚地认识西方哲学和文化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古希腊“是”有存在的含义,人们却没有用一个不同的概念,比如用“存在”这个概念来表达它?为什么“存在”这一概念在古希腊没有出现,而在探讨上帝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为什么“存在”这一概念尽管是在探讨上帝的过程中产生的,却依然与“是”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既然“存在”与“是”是有联系的,它们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当然,由此还可以进一步产生一些问题,比如有关宗教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等。因此,区别还是不区别“存在”与“是”这个概念,会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与理解西方哲学都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最后我想谈一谈“是”与“存在”的关系。在以上讨论中,有几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一点是,“是”与“存在”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另一点是,“是”与“存在”乃是在不同时期形成的概念。还有一点是,“是”也有“存在”的意思,或者,“存在”可以表达“是”的一部分含义。从这几点出发,显然可以问:“是”与“存在”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认为,“是”与“存在”的关系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且不论从哲学本身可以如何讨论这个问题,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至少可以考虑如下几个问题。其一,西方哲学家一直在探讨“是”(einai,esse,to be,Sein 等等),但是由于它也有存在的含义,而且后来也有了明确的“存在”概念,那么西方哲学从古到今的核心概念究竟是“是”,还是“存在”?其二,尽管古希腊只有“是”而没有“存在”这个概念,但是由于“是”这个概念也有存在的含义,那么古希腊哲学的核心概念究竟是“是”还是“存在”?其三,由于中世纪以后有了“存在”的概念,因此人们不仅知道这个概念,而且以它使古希腊哲学中“是”的存在含义具体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当人们谈论“是”的时候,人们考虑的究竟是“是”还是“存在”?

我认为,思考这些问题是有意义的。比如,国内学界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不同的语境来理解西方哲学,根据不同的语境而采取不同的译名。^②而按照

① 我曾比较详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第 184~223 页。

② 例如参见王晓朝:《读〈关于“存在”和“是”〉一文的几点意见》,宋继杰编:《Being 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第 48~54 页。

这样的理解,有些地方就应该把 being 翻译为“是”,有些地方就应该把 being 翻译为“存在”;有人也确实明确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应该用“是”,黑格尔的理论应该用“有”,而海德格尔的理论应该用“存在”。^① 我同意应该认真分析思考不同的语境,因为这是理解西方哲学的基础。问题是分析思考不同的语境是不是能够得出以上结论。这里当然需要认真地具体地分析,而不能只是思辨地讨论。^② 但是直观上就可以看出这里会有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由于语境的不同,难道西方哲学家讨论的是不同的东西吗?具体地说,比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所谈的难道是不同的东西吗?而如果依据我们前面的讨论,则可以问: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区别究竟在于他们谈的本来就是不同的东西,即“是”、“有”和“存在”呢,还是在于他们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同一个东西?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则看不到西方哲学在“是”这个问题上一脉相承的延续和发展。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可以看到他们所谈论的乃是相同的东西,只是他们谈出了不同的意义,这样就可以看到“是”这个问题在西方哲学中贯彻始终的特征,因而体会到它的核心地位和重要性。

所以我认为,“是”与“存在”之间的关系是:在语言层面上,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词;在概念层面上,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比之下,“是”乃是先出的词,而且也是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概念,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涵盖“存在”的含义,比如卡恩所说的它的存在用法。“存在”则是后出的词,而且是从“是”派生出来的概念,但是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它可以解释“是”的一部分意义,但不能说明“是”的最主要的意义,尤其是不能说明“是”的系词含义。在西方哲学史上,当人们谈论“是”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考虑到存在的含义,有时候可能不会考虑到存在的含义。这样的认识需要我们在具体的语境中去分析和把握。而且这样的认识和把握,在“存在”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和产生以后,区别是很大的。因为在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只能从哲学家们对“是”的论述来体会其中的存在含义,而在有了这个概念之后,虽然有时候仍然需要这样的体会,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家们明确地用“存在”对“是”进行说明,甚至还可以看到逻辑学家在逻辑著作中这样的定义。^③

① 参见赵敦华:《“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辨》,载《学人》第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② 我认为得不出这样的结论,而且我也曾比较详细地讨论过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第280~315页;第316~369页。又见王路:《“是”与“存在”或“有”——理解黑格尔》,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③ 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第205~213页。